



世纪文库

中国古代 木刻画史略

郑振铎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

郑振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 / 郑振铎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12
(世纪人文系列·世纪文库)
ISBN 978-7-5458-0547-5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木刻—绘画史—中国—古代 IV. ①J2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0687 号

责任编辑 沈佳茹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王晓阳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

郑振铎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10,000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547-5/J·136
定 价 26.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

郑振铎先生的最后一部奇书

——唯大时代乃产生大著作

陈福康

《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是郑振铎西谛先生呕心沥血撰著的一生中最后一部开拓性的学术专著。这部书在西谛先生为国牺牲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首次以单行本形式正式出版，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西谛先生哲嗣郑尔康老师和上海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金良年兄，让我在书前写一篇导读文章，我深感这是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惶恐的是自己对中国木刻画（版画）史缺少研究。不过我一直研究西谛先生，熟悉他以毕生精力搜集、保护、编印、研究中国木刻版画的动人事迹，探讨过他多年反复构思、几度因故搁置、然而锲而不舍、最后百忙中卒底于成的艰辛经历，还知道此书原稿在他身后长期湮佚而终于复现的曲折故事，以及书稿发表后在国内外美术界、学术界、出版界所引起的巨大轰动等等。我想，我主要就来写写这些“掌故”，当能对读者有所帮助（记得当年鲁迅先生给西谛先生的信中，夸奖西谛为他俩合作编印的《北平笺谱》作的序写得好，就说是“内函掌故不少”）。读者如果了解了此书凝聚着的那么多生动、丰富的“掌故”，更不用说此书本身博大精深、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就一定会觉得它是一部真正的奇书！

—

这部书，代表着西谛的一生爱好，也寄托着鲁迅的殷切期望。

事情得从头说起。西谛少年时代，就因喜读旧小说，从而爱看小说书前的“绣像”。1920年代初，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开始研

究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便留意于刻本之插图。有一天，他在旧书店看到了有“全图”的《笠翁十种曲》、《浣纱记》、《红梅记》、《焚香记》等书，不禁怦然心动，然因书价高而犹豫再三，最后终于咬咬牙买下。这些便成了他的版画宝库的奠基品。后来便越收越多。当时，他不知道鲁迅也对木刻画深有兴趣，只是孤独地做着这无人顾及的工作。

1924年起，他撰著的《文学大纲》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发表，其中国文学部分附印了很多古代版画，颇受读者欢迎。1925年4月，他写信向鲁迅请教小说史方面的问题，鲁迅回信并寄赠了明刊插图的《西湖二集》六本。西谛为之狂喜。鲁迅逝世后，西谛写的《永在的温情》回忆文中便写到此事，在他的这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的注释中，又不忘写上了一笔。当时，商务印书馆同事周越然也开始买带版画的古书了，他们便常常交换着鉴赏，视界因以渐广。未久，吴梅先生编印《奢摩他室曲丛》时，以所藏明版曲书移交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西谛因此一时获睹很多带版画的珍籍，眼界更为之大开。他撰写一篇长文《插图之话》，发表于1927年1月《小说月报》上，文中附印了不少版画。这不仅是我国近代研究中外书籍插图的最早的论文，而且文中也最早论述了中国木刻画的历史。

从这时起，他就暗暗立志，要为中国版画编一选集，并进而修一专史。自此他对版画书有见必收，而且还专门带了摄影师，到周越然、吴梅等人家中遍阅所藏版画书，并摄影。他的这一浓烈的爱好和当时已成国内第一的版画收藏，开始在文艺界广为人知。1931年6月9日，鲁迅便由冯雪峰、蒋径三陪同，并带日本青年增田涉，兴致勃勃地“往西谛寓，看明清版插画”。

这是鲁迅日记中所记第一次上他家作客。27日，西谛又托同事蒋径三带给鲁迅一盒印有彩色版画的信笺及一盒信封。7月23日，他又寄赠鲁迅一部《百华诗笺谱》，鲁迅即复信道谢。这部笺谱是1911年天津文美斋木刻彩色套印的（其实从鲁迅“书账”中可知，早在1912年4月29日鲁迅就已购买过了）。

这时，西谛还认识了几位热爱版画的朋友。其中就有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赵万里，和在北平各大学任教的马廉。1931年8月，赵万里来上海访书，西谛便同他一起去宁波访问回乡度假的马廉。在宁波，他们拜访了不少藏书家，也见到了不少版画书。一天，马廉拿出了一本抄本《歙中绣刻图画名手录》，所记乃是明代徽派木刻家的姓氏、谱系，并说：此录创自陈大镗，北平通县王孝慈得之，作了增补；马廉从王孝慈处抄来，又作了增补。西谛一看，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因为他虽然注意于版画的刻工，但因缺乏史料，不曾作系统的研究。而且，他发现马廉以前到他家看书时所见的几个刻工姓氏，均已补入其中了。他为马廉的勤奋与细心而佩服。他和赵万里便连夜各自抄录了一份。后来他又作了若干增补。那几天夜里，他们睡在马廉老家的西厢房，老屋屋顶作半穹形，他觉得很像明代版画中的样子，便笑着说：“我们成了王伯良校注《西厢记》的版画中人物了！”

这次宁波之行，西谛终生难忘。他后来在《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序》中还提到当时抄写的那本姓氏录，提到陈大镗、王孝慈、马廉等人，并说：“这当是中国木刻画史的‘椎轮’，我当时曾传抄一部，也补充了若干则，便是这部《史略》的初步基础。我应该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敬意和谢意，他们一生酷嗜古代的木刻画，搜集了不少资料，虽不曾留下什么著作，其创始之功是应该加以记录的。”

宁波回来后不久，西谛离开上海到北平工作。北平市里有一个最古老的名刹法源寺，其佛像最晚的已是明代前期所塑。这些塑像背后都有一个方孔，当初塑造时或后来重修时，曾把经卷、历本等文书投入方孔，以祈福佑，或记年月。人称这为“佛脏”。“九一八”事变后，寺僧生活困难，便开始掏佛脏中的经卷等，偷出去卖钱。一旦被识货的书商发现，便互相勾结，大量盗卖散失。而越掏越深，越在底下的文书，年代越久，价值越高。正在这关键时刻，被西谛知道了，赶紧不惜代价抢救保存。他购得古刻本佛、道书二百多种，其时代从宋元到明嘉靖都有。最令他欣喜的是，其中多有木刻画，正好填补明代嘉靖以前中国版

画史的一段空白。从此他更认真地考虑要编一部反映中国版画历史全貌的大书了。

可是，连西谛自己也没想到，他最先编印的版画，却是时代最近的笺谱。那是鲁迅提议的。而鲁迅的建议却又是因为西谛的赠书引起的。1933年2月3日，鲁迅收到西谛的新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前三册，对书中印入版画插图十分欣赏，加上以前西谛曾赠送过笺谱，终于引发鲁迅向他提出一个考虑多时的计划。5日，鲁迅写信致谢，并正式提出一个建议：“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和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但此事恐不久也将消沉了。因思倘有人自备佳纸，向各纸铺对于各派择优各印数十至一百幅，纸为书叶形，彩色亦须更加浓厚，上加序目，订成一书，或先约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实不独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鲁迅殷切地询问：“不知先生有意于此否？”鲁迅提到的《文美斋笺谱》，正是一年半前西谛赠送的《百华诗笺谱》。

鲁迅的建议，句句说在西谛的心坎上。后来，1934年1月，终于诞生了一部鲁迅、西谛合编的《北平笺谱》。当时二位先生反复商量研究，历尽曲折和辛苦，甚至遭周作人之流的嘲讽，其中故事亦复不少。由于此书知者较多，这里就不详写了。鲁迅高度肯定西谛的苦干精神，并认为这是“草创”的工作。鲁迅在《北平笺谱序》中说：“此虽短书，所识者小，而一时一地，绘画刻缕盛衰之事，颇寓于中；纵非中国木刻史之丰碑，庶几小品艺术之旧苑，亦将为后之览古者所偶涉欤。”鲁迅在提议信和这篇序中，多次提到“中国木刻史”，是意味极为深长的。

在《北平笺谱》刚刚印好的时候，西谛又向鲁迅提议重刻《十竹斋笺谱》。该笺谱是明末刻印的，正值中国古代木刻艺术最鼎盛时期；又由于明清之际大乱，经过三百年，此书已极为罕见。西谛多年访求，当时仅知有三部。一为天津陶湘所藏，待他写信去问，则已卖给日本某书店；等他再去信日本，对方却推说已卖出。又一部为上海狄楚青所藏，

则秘不示人。还有一部即北平通县王孝慈所藏，西谛通过赵万里把它借来，即请荣宝斋翻刻重印。

西谛雄心勃勃，还想不止复活这一部版画书，而且要进一步编印成系列的《版画丛刊》。这点更获鲁迅赞许，称为“尤为佳事”。后来《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封面即标明为《版画丛刊》之一。鲁迅并从实际出发，建议有的古版画可以不采用费时费钱的复刻，而用珂罗版石印。这一条西谛当时就采纳了。鲁迅逝世后，西谛二十多年编印版画，也是这样做的。在复刻《十竹斋笺谱》的同时，西谛又请珂罗版印刷厂试印了若干版面样张，并寄给鲁迅看，鲁迅认为“印刷甚好”，同时指出：“有图无说，非专心版本者莫名其妙，详细之解说，万不可缺也。”这实际上正可看作是鲁迅殷切希望西谛撰写一部“万不可缺”的中国版画史。

重印《十竹斋笺谱》与《北平笺谱》有两点不同。一是此次乃由西谛提议，鲁迅赞助；二是不只是重印，而首先得重刻，不仅费用高得多，而且刻印的店铺仅荣宝斋一家，所以进度很慢。第二册付刻后，工未及半，日军侵略，燕云变色。不久，他又被迫辞去在北平的教职，又困于资金，复刻工作几至中辍。第二册未完工，鲁迅已不幸逝世。未久，王孝慈也逝世。又未久，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工作便停顿。该书最后一册复刻印成，要一直到1941年11月（列入西谛主编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中），才合为完璧。

二

鲁迅逝世翌年，故都沦陷，上海成为“孤岛”，硝烟翻滚，复刻古代版画之事当然无从提起，即使珂罗版摄照石印的工作也进行不下去了。但是，鲁迅的遗愿和嘱托，保卫文化遗产的责任，西谛一刻也没有忘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上。

第一，他在上海，在日寇劫火中，继续拼一己之力，尽量抢救、保全有关古代木刻史料。

明代遗民陈老莲、萧尺木两家绘《离骚图》，他早就有了罗振常复印本，甚至还曾不惜高价买过萧氏绘初印本（残缺），并以武进陶氏摹本配齐。但当他在“孤岛”上海见到因战火而流散出的萧氏《离骚图》初印全本时，虽在朝不保夕的景况下，仍毅然购之。他在《劫中得书记》中写道：“访求近十五年始得其全，一书之难得盖如此，诚非彼有力之徒，得之轻易，而惟资饰架者所能知其甘苦也。”

一次，西谛听说一位他不认识的张尧伦先生近收得一部萧尺木绘《太平山水图画》（此书他在十多年前就曾在旧书店见过，可惜当时已被日本人买走），于是便托人向张先生求借。借来后，见木刻“图凡四十三幅，无一幅不具深远之趣。或萧疏如云林，或谨严如小李将军；如繁花怒放，大道驰骋；或浪卷云舒，烟霭渺渺；或田园历历如毡纹，山峰耸叠似岛屿；或作危岩惊险之势，或写乡野恬静之态。大抵诸家山水画作风，无不毕于斯，可谓集大成之作已！”（《劫中得书记》）他拍案惊奇，赞叹不已，又力恳张尧伦允许他摄照翻印。张尧伦有感于他这般“痴情”，慨然同意用他收藏的几部太平天国方面的书作为交换。他大喜过望，在《劫中得书记》中写道：“于是此‘版画’绝作，遂归于余。十载相思，得遂初愿，喜慰何已！而尧伦割爱相贻之情，亦‘衷心藏之无日忘之’也！”

他当时不顾一切地买了很多书，如明版徐光启《农政全书》、杨尔曾《海内奇观》、金忠《瑞世良英》等等，除了因为这些书本身内容的价值外，也是与它们的木刻图有关的。这些木刻画，他后来都写进了《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还将它们选入《中国版画史图录》等书中。像《太平山水图画》，他当时还专门写了文章，又因其几乎幅幅皆精，不忍舍去一幅，竟全收于《中国版画史图录》。

最可一提的是，在那样不幸的艰苦的年头，由于西谛先生精诚所至，竟然奇迹般地得到了他一生版画收藏中最大的收获——一年内获得

中国木刻画史上两部“伟著”！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余收集版画书二十年，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惟彩色本程君房《墨苑》、胡曰从《十竹斋笺谱》及初印本《十竹斋画谱》等三伟著耳。”《程氏墨苑》，明万历彩印本，原藏天津陶湘处，为海内孤本。当年鲁迅就一直感叹未能见过。西谛曾携张元济老先生亲笔介绍信前往天津，才得以目睹，并抄下目录。他当时再三叮嘱陶湘：“此书决不可卖！”抗战爆发，陶湘避居沪上，生活困难，靠鬻书以活。西谛也因生活所迫，刚将自己一批戏曲藏书让归国家图书馆，囊有余金，便急向陶湘买下此书。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此‘国宝’也！”“书至之日，灿灿有光，矜贵之极。曾集同好数人展玩至夕。”他在《劫中得书记》中又说：“十载相思，一旦如愿以酬，喜慰之至，至于数夕不能安寝。”

《十竹斋笺谱》，前已说过，西谛曾向北平王孝慈借来翻刻。刻成第一卷后，鲁迅与王孝慈相继亡故，西谛继续与王氏后人相商续借续刻。可是王家此时极窘迫，不能不售书以谋葬事。这部笺谱后来卖给了北平图书馆。当时西谛还曾托北平友人表示欲买下，其实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因为当时他根本没有这笔钱。所幸此书终归国库，北图负责人是西谛的朋友，慨允借用。但他从未奢望过自己能收得此书。不料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有书贾竟从淮城一带购得一部，特地送到他家里，于是他倾囊购之，并在《劫中得书记》中悲喜交加地写道：“生平书运之佳，殆无逾于此二年者。虽困于危城劫火之中，亦不禁为一展颜也。”他还写道：“一灯如豆，万籁俱寂，深夜披卷，快慰无极！复逐页持以与余翻刻本对读，于翻刻本之摹拟入神处，亦复自感此番翻刻之功不为浪掷也。”这种激动、自豪的心情，一般人又如何能体会到呢！

至于初印本《十竹斋画谱》，西谛也有收藏。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这些“国宝”，在西谛牺牲后，都已按照他生前意愿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而且，今知西谛所捐《程氏墨苑》共有四部，《十竹斋笺谱》共有三部，《十竹斋画谱》共有四部（另还有清刊本一部）之多！可知西谛后来仍有见必收。他的这种爱护国宝的精神是何等感人啊！

第二，在上海“孤岛”后期最紧张、艰苦的时候，西谛开始撰写《中国版画史》，并编印出版多卷《中国版画史图录》。

据当年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回忆，1939年夏，西谛约他去家里商谈有关出版《中国版画史》的事。原来，自与鲁迅合作计划编印《版画丛刊》以来，西谛一直在默默地断断续续地做这方面的工作，有关木刻图他也已投资印好不少。现在，他打算把这部精心设计、计划共二十四卷的巨著，交给良友公司在二三年内出版。其中四卷为《中国版画史》，二十卷为图录。西谛曾经给过良友公司巨大帮助，而且他这次自己承担印刷装订等费用，加上他反复强调了此书的价值，良友便答应给予合作。

1940年1月号《良友画报》上，西谛发表了《谭中国的版画》长文，并附木刻二十余幅，作为对读者的首次声明。文末说“我二十几年来，专意搜集我国版画，所得附插版画之图籍在三千种以上。所见所得单幅之年画亦不下二千幅。有见必收，有闻必录，在各公私图书馆及各收藏家所摄得之版画影片亦盈数篋。近发愤聚集所得之材料，编为《中国版画史》四册，《中国版画史图录》二十册，交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经营，或足一雪世人忽视我国版画之耻罢。”

西谛还为良友公司用中英文编了一本《中国版画史样本》，印出供预购者参考。据样本介绍，西谛计划分写唐宋元版画史、明初版画史、徽派版画史、近代版画史等，共约三十万字，编成四册，作为这部巨书的正文。“正文部分，考释源流，钩稽史实，创写传记，评鹭图型，在在皆第一次见之文字者。积稿数尺，用力甚劬。”他还谦虚地说：“或有未谛，恕其草创。”样本还载西谛1940年1月7日所作《中国版画史自序》，用精炼的语句概述了整个中国古代木刻画史，并说：“世事瞬息万变，及今不为纂辑，则并二十余年来所见搜集者或将荡为轻烟，虽百身何赎乎？因悍然不顾其疏漏，先就所已得者，次第刊印行世，或有以际斯沧海横流，狐兔群行村落中，救死不遑，匡时为急，而乃荒时废业以务此不急无补之作见讥者。余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书生报

国，毛锥同于戈戟。民族精神之寄托，唯在文化艺术之发扬。历劫不磨，文事精进，乃可卜民族前途之伟大光荣。”他提到了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意大利的但丁、德国的歌德和席勒，还有中国的司马迁和章太炎，说明他们的著作“胥写于辛劳忧勤之中”。“唯大时代乃产生大著作。我民族光荣之建设，正息息在牺牲与奋斗中迈进。余之兹书，或亦不贤识小之所贡于我民族者乎？”这些话，把撰著这部书的伟大意义阐述得透彻无比。

图录前几辑，由于早已印好，经装订成帙，编成四卷（册），就装入丝织锦缎套函，发售给预约者。原计划每隔四月出一辑（函），估计两年就出齐，包括文字部分的一函四册。但当时西谛精力所限，只能先忙于编印图录，加上“孤岛”形势所迫，实在无法关起门来专心写史；而且，几乎在他刚向读者声明写版画史的同时，1940年1月19日，他又与张咏霓、何柏丞、张元济等先生秘密成立了一个“文献保存同志会”，开始为国家在战火中大规模抢救珍本古籍。这是更加迫在眉睫、更加重要的工作，西谛为之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心血。因此，《中国版画史》在“孤岛”时期也就一直没能写成。而图录部分，从1940年5月至1941年12月8日上海“孤岛”沦陷、良友遭日军查封为止，共陆续出版了四函十六册。直到抗战胜利后，西谛又请上海出版公司印行了四册一函，总算把图录部分作个结束，以不愧对预订者。真是用心良苦！但是那部西谛打了无数腹稿，而且数次开笔又辍笔的《中国版画史》，却未能问世，以至后来很多人都只知道有一部《中国版画史图录》了。

尽管如此，皇皇二十巨册，共收图千余幅的《中国版画史图录》的出版，也是圆了当年西谛与鲁迅计划编印《版画丛刊》的夙愿，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1947年出版的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说得好：“在孤岛的上海，那里有特殊的政治环境，给那里的文艺战士们以特殊的任务：和汉奸们肉搏，在敌伪的压制、恫吓下奋斗。在那里，《鲁迅全集》和郑振铎编的《中国版画史（图录）》的出版，不能不说

是抗战期间文艺界的大事。”（按，《鲁迅全集》的出版，西谛也是出了大力的。）

这里还想提到的是，在上海完全沦陷于日寇铁蹄下的近四年间，西谛被迫离家变名隐居时，仍把最心爱的一批版画书从家中转移出来，带在身边。可知他这时还是想把这部《中国版画史》写出来的。到1944年，为了全家人活命，他被迫一次次忍痛出卖自己的藏书以换米，他后来在《求书目录》中写道：“虽然把旧藏的明刊本书，清刊的文集以及四部丛刊等书，卖得干干净净，然而所最喜爱的许多版画书、词曲、小说、书目，都还没有卖了去，正想再要卖出一批版画书而在恋恋不舍的时候，天亮的时间却已经到了。如果再晚二三个月‘天亮’的话，我的版画书却是非卖出不可的。”可见，西谛宝藏这批国内外第一的版画书，是多么不易啊！

三

抗战胜利后，西谛立即投身于民主运动现实斗争的第一线，自然无暇于木刻画史的撰著。1947年起，他又花巨大精力编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以及《韞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等巨型图籍。这些书也都有着不得不出理由，耗费了他无法估量的心血，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至今令人惊叹的成绩。日月如梭，历史进入新中国时代，西谛担任了国家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但在繁忙公务之余，他还撰写、编印了《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等书。上述《历史图谱》和《艺术图录》中也用了有关木刻画，在其说明文字中也涉及版画史。

1952年9月6日，西谛致上海出版公司刘哲民信中提到：“又在写《中国古代版画》一文，写好后，也当寄上。如果不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出，则当交‘公司’印出也。”不是投寄给报刊发表，而是要